昆明学院学报　2017, 39(1):1~5　ISSN 1674-5639　CN 53-1211/G4
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儿童文学研究】

编者语:本期栏目所选五篇论文,分别以文学史撰写、散文创作、绘本创新、童话类型等研究为主要内容。其中对《贵州儿童文学史》的书评,作者在评价的同时,还阐述了本人关于儿童文学史撰写的观点。儿童散文创作研究一文,以较为独特的视角和新颖的观点论及儿童散文创作主体的记忆特征。而关于绘本研究的文章,作者通过对传统绘画技法在绘本中的运用分析,力图为中国民间文学绘本化探寻新思路。对于童话类型研究的文章,虽是旧话重提,但作者就并不陌生的话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有利于帮助读者、儿童文学教育工作者拓展研读作品的思路,丰富儿童文学的研究。

《贵州儿童文学史》的编写及其巨大传承价值

彭斯远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030)

摘要:《贵州儿童文学史》是作者马筑生在刻苦踏实收集材料,认真分析研究多年以后的学术产物。它的成书向人们证实:文学史对于后人的创作,具有重大的历史借鉴和传承价值。不管是中国"灰姑娘型"童话的创作传播,还是谢六逸的童话与孙铭勋的儿童诗歌创作,都一再证明前人的成功创作,对于后人创作具有极大的借鉴启迪价值。所以文学史的编写和出版,对于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功不可没。

关键词:贵州儿童文学史;多元族群共生;"灰姑娘型"童话;谢六逸;孙铭勋;借鉴传承
中图分类号:I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7)01-0001-05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7.01.001

Compilation and Great Inherited Values for *History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Guizhou Province*

PENG Siyu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400030)

Abstract: *History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Guizhou Province*, theacademic achievements by Ma zhusheng after his many years' of collecting and analyzing materials, shows that literary history is of great historical reference and inheritage for the creation of the future generations. Both the creation and spread of fairy tales for the pattern of Cinderella and the fairy tales by Xie liuyi or the children's poetry by Sun mingxun prove the great values of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the future creation, and the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s of literary history are fundamental for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creation.

Key words: history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Guizhou province; multi-ethnic symbiosis; fair tales for the pattern of Cinderella; Xie Liuyi; Sun Mingxun; reference and inheritage

马筑生400余页的《贵州儿童文学史》[1],是一部回溯贵州儿童文学历史足迹的理论书。理论书太厚了,往往会让读者摇脑袋。即便如此,但我仍然觉得,对于内容精彩厚重而需要多一些篇幅来予以表达的书籍,它的存在价值同样是很值得肯定的。《贵州儿童文学史》,就属于这种类型的史书。产生上述认识,源于我对于编写儿童文学史的一点粗浅体会和教训。

在21世纪初,我和当时还在重庆西南师大文学院执教的王泉根商量,编写一本类似西南儿童文学

收稿日期:2016-11-21
作者简介:彭斯远(1940—),男,四川成都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西部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研究。

史那样的著述,以便推动和促进在全国还较后进的西南儿童文学创作。我们希望通过儿童文学史的编写来促进为孩子们而创作的文学门类得以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我当时不仅通过自己所在的重庆师大中国西部儿童文学研究所向有关部门拟写了关于编写西南儿童文学史的开题报告,还致信筑生兄,希望他能够参与到写作团队中来。

因为资料收集匮乏,编写力量不足,加之对于西南数省儿童文学史编写工作量的巨大估计不足,原来跃跃欲试的编史初衷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冷却下来,今天想起来非常惭愧。后来我与本校的一些儿童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生合作,写作并出版了《重庆儿童文学史》[2],也算对于儿童文学史写作兴趣的一种延续,文学研究中积累起来的文学史写作情结,终于在这儿得到了一点儿体现。

让我丝毫也未估计到的是,庞大的"西南儿童文学史"写作计划虽然搁浅了,但筑生却在原有分工基础上,以其顽强的毅力成就了他的《贵州儿童文学史》。舍弃不切实际的一端,细致操作可行的另一端,筑生的选择,既科学又务实。[1]

《贵州儿童文学史》的确因花工夫深入发掘而得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可贵史料。该书的最大特色是准确的视觉定位——始终不忘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因此研究贵州的儿童文学,就必然从我国多元族群共生的儿童文化来反映自己的独特地域文化特征。由此观念出发,写作贵州的儿童文学史,不能简单地抄袭或复制其他汉民族聚居区域的儿童文学特点,否则,贵州的儿童文学史就丧失自己的特色了。

由上述构想出发,筑生发掘出许多特色鲜明而说服力极强的新鲜史料。譬如,在黔东南侗族中,至今还流传着母亲为孩提催眠的童谣《哄儿歌》[1]5。该童谣虽然只有"啊哈哈/怜爱啊"短短两句,歌者却用轻盈平和而充满乐感的语调反复吟唱,倾诉了母爱的温柔。这实际就是一首反映原始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妇女抚育孩子的古老歌谣,当然,这也是昔日周作人所说的中华民族"母歌"里的侗族摇篮曲。作者通过该童谣的收集和艺术分析,充分肯定了它的思想艺术价值,这和其他地方的儿童文学史对摇篮曲的艺术认定自然是有本质区别的。

又如,《贵州儿童文学史》认定,1906 年贵州一个叫周逸群的 10 岁小学生编写的《童谣》[1],把一个外号铁算盘的财主盘剥帮工的狠毒和爱钱如命的个性刻画得入木三分:

郭铁珊,
铁算盘,
仓廪白米运江南,
绫罗绸缎赚大钱。
帮工吃不饱,
还要挨皮鞭。
一个小钱掉下河,
舍着性命摸半天,
钱同命相连。

而王泉根在他的《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3]一书中认为,刘半农 1918 年刊于《新青年》的那首反映贫富悬殊的童诗《相隔一层纸》,以及描绘儿童情趣的《题女儿小蕙周岁日造相》是中国最早的白话童诗。《贵州儿童文学史》通过事实的对比认定,贵州小作者周逸群于 1906 年创作的《童谣》比刘半农 1918 年刊于《新青年》的那两首白话儿童诗整整早 12 年。所以,周逸群虽然是个小学生,但他因那首艺术质量颇高的《童谣》成为我国现代白话儿童诗最早的创作者。通过史料的发掘和对比,《贵州儿童文学史》将我国白话儿童诗创作的最早时间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贵州儿童文学史》的出版,令我还想到,作为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文学史著的倡导实在很值得重视。过去,我们在发展创作的同时也很注重理论研究,但在理论研究中,却更多关注当前文学作品的评论,而忽略史著的编写和出版。即使在儿童文学理论队伍中,也有人认为,写史是大学文学院教授们的事。截至目前,我国许多省还没有儿童文学史,至于我国儿童文学的通史、断代史,或体裁史、地域史,更是少得可怜。

记得儿童文学大师陈伯吹生前曾多次说过,上海是我国儿童文学的重要发源地。由此,他呼吁编写一本上海儿童文学史。但是,编写上海儿童文学史的头绪太多,任务太繁重,陈伯吹生前的遗愿一直未能实现。因此,我想借《贵州儿童文学史》出版的东风,把陈伯吹先生为儿童文学写史的呼唤再度提及。如果能出一本期待已久的上海儿童文学史,甚至是中国儿童文学史,这对于填补历史的空白和繁

荣,当是我国儿童文学再好不过的了。

说到儿童文学史著的编写和出版,还令我想起英国大诗人雪莱说过的一句名言:“历史,是刻在时间记忆上的一首回旋诗。”不言而喻,雪莱因非常推崇诗歌创作而特别酷爱诗歌,所以他用须臾不可离开的诗歌来倾诉自己对于历史的喟叹。而对于我们的儿童文学来说,为什么不可以在这历史的追忆中去努力咀嚼那首美不胜收的“回旋诗”呢?事实上,如果我们回到《贵州儿童文学史》的阅读和打量上来,我们就可以从中找到许多儿童文学创作被历史“回旋”而产生杰出儿童文学作品的大量典型例证!

这里先举一个特别典型的历史事实来加以说明。那就是,一个具有特别影响的中国“灰姑娘型”童话,居然从地球的东方而传到欧洲并在全世界广泛流行开来。

对此历史“回旋”的事实,《贵州儿童文学史》一书在第 177 至 185 页的大量篇幅中,曾这样告诉我们:作者通过我国杰出童话研究家周作人在 1914 年所写《古童话释义》一文的回顾后指出,我国晚唐文人段成式所著《酉阳杂俎》记载的那个“灰姑娘型”童话即少女叶限的故事,与法国夏尔·贝洛尔童话《灰姑娘》,在故事情节、表现手法和主题思想方面,表现出了非常难得的大同小异特征。于是人们对此不禁发出疑问:为什么不同时代,不同国别,不同民族,不同作家写的作品竟会显示出如此惊人的一致性?此一现象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

《贵州儿童文学史》一书通过反复研究,对于上述质疑得出了一个结论:“段成式记载的‘灰姑娘型’童话故事,通过来大唐做生意的阿拉伯人传播到了阿拉伯地区,然后扩散到了欧洲。”以后法国作家夏尔·贝洛尔又根据从阿拉伯地区传来的这个中国故事而创作了自己的“灰姑娘”童话。不仅如此,《贵州儿童文学史》通过比对,还进一步指出,《酉阳杂俎》所记载的这个“灰姑娘型”童话,又来源于贵州![1]177

在《贵州儿童文学史》第 177 页末行,作者还说,“笔者通过研究,认为此类童话故事最早的源头,在当今贵州东南的侗族聚居地区,是这个地区古代‘洞人’的伟大创造。”结论虽然如此简单,但作者为了论证自己结论的正确性,却花了大量笔墨来详加阐释和说明。

《贵州儿童文学史》向我们有力证实,关于中国“灰姑娘型”童话从贵州侗族地区产生开始,以后经由唐代文人段成式所著《酉阳杂俎》的记载得以传播,以后又通过来中国经商的外国生意人将其带到到阿拉伯地区,而后再传播到欧洲以致扩展到全世界。这一事实说明,一个中国童话经过不断传播扩散的历史演绎,“刻在时间记忆上的这首回旋诗”,不断变换扩展,从而创造了新的历史,创造了崭新的中国和世界的童话,从而推动了世界儿童文学的大踏步前进!

通过《贵州儿童文学史》的编写与出版,这个中国“灰姑娘型”童话从地球东方传到欧洲并在全世界流行开来,并最终于得到演绎和扩散的历史事实得以记载。《贵州儿童文学史》的编写与出版,让我们的祖先创造历史的功绩得到弘扬,让我们当今的儿童文学得以飞跃。这一历史事实说明,儿童文学史对于后人具有强大的历史借鉴功能,它为后代作家的创作实践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而后人一旦取得这样的借鉴,并转化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就将大大提升自己的儿童文学创作水平。

例证之二,《贵州儿童文学史》记载的谢六逸,是 20 世纪我国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上与茅盾、郑振铎、叶圣陶、夏丏尊等大家齐名的贵州儿童文学作家,其创作出版的童话集《鹦鹉》《红叶》和《彗星》等作品,证明他就是“译介外国神话、传说故事等幻想文学作品的集大成者”[1]205。《贵州儿童文学史》通过对比研究得出的此一结论,说明这位作家正是通过“刻在时间记忆上的回旋诗”来回放日本和许多西方国家的历史神话传说,从而得以创作出自己的不朽杰作的。马筑生在《贵州儿童文学史》第 205 页中还高度评价过谢六逸的童话创作成就。为此,他写道:

> 谢六逸是贵州现代作家中创作童话的第一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坛童话园地最早的拓荒者之一。他的童话创作是他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最早尝试,同时,其童话也明显地记录了中国当时艺术童话创作的大致风貌。

另外,谢六逸于 1924 年发表的著名童话《夏茂冬枯》[1]357叙述了六个仙女生活在一个风景异常美丽的深山里,她们一边在清泉里沐浴,一边听着鸟儿欢快地歌唱,日子过得非常惬意。但是,为仙女带来

快乐的花神却不幸被地神抢到地下去了,花神在地下住了六个月。当她住在地下时,因无法照料人间花草,以致花草枯萎,鸟儿也停止了歌唱。只有当花神回到地上居住的另外六个月,花草得到她的精心管理,才重新发芽生长,鸟儿也再度欢叫起来。这个故事,显然是借鉴希腊神话和《圣经》故事中那些关于一年春夏秋冬四季形成原因的艺术解读里创造而来的。

没有希腊神话和《圣经》故事对于谢六逸的创作启迪,他的《夏茂冬枯》显然是写不出来的。而且,因为《圣经》是古希伯来人创造的宗教经典,其中包含的寓言故事极富文学价值,所以它与几乎同时产生于世的希腊神话,被有的学者并称为"二希文学"。"二希文学"中的许多故事,不但反映了早期人类文学的基本艺术形态,许多故事更天然地具有某些蒙昧的儿童文学本质特征。从"二希文学"中一年春夏秋冬四季形成原因的幻想性解释中受到启发,谢六逸从而创作出了自己的童话《夏茂冬枯》。这个事实说明,只有借助不同时代世界各国作家的相互启迪与传承,才能有力促进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繁荣。这难道不是作家通过"刻在时间记忆上的回旋诗"来进行文学创作的又一有力证据?

例证之三,《贵州儿童文学史》记载的孙铭勋,同样也是 20 世纪在我国儿童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上有较大影响的作家。其在儿童文学特别是童话与诗歌创作上,更显示出对于我国传统儿歌艺术风格的大力继承与创造性地运用[1]373。孙铭勋是我国平民教育家陶行知的忠实继承者与执行者,1923 年夏,孙铭勋开始在贵阳师范学校就读,为追随陶行知而于 1929 年考入南京晓庄师范学校,从此成为陶行知门下的忠实弟子。后来又为追随陶行知而来到陶所在的重庆育才学校执教。再后来调入西南师院,在其中文、教育二系从事儿童文学教学。

在这里,孙铭勋同前辈作家谢六逸一样,不仅从事儿童文学教学与理论研究,还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他深知,贵州是大量产生儿歌童谣的一块宝地。受此影响,当他来到四川重庆生活后,孙铭勋便非常注意收集整理当地的儿歌童谣。经孙铭勋整理修改的童谣篇幅短小,语言通俗、幽默诙谐,构思巧妙。当他以拓林名义将自己收集整理的《四川儿歌》寄到上海不久,少年儿童出版社因其质量上乘而很快配以著名美术家林曦明的精美剪纸插图于 1957 年出版。一时间,该书成了国内儿童图书市场的抢手货。

关于拓林儿歌的艺术风格,这里首先得指出,其书名虽为《四川儿歌》,但却明显具有贵州高原童谣拥有的那种山野蛮荒和粗野的艺术气息,这是因为拓林即孙铭勋是贵州人的缘故。所以他把贵州漫山遍野产生的童谣所具有的粗犷与蛮荒气息,传承给了四川儿歌。而这与我国江南水乡儿歌的温柔抒情,显然是完全不同的。其次,拓林儿歌又深受四川民众诙谐机智个性的影响。我们知道,巴山蜀水曾广泛流传着两个俗语:一是"涮坛子",一是"扯把子"。"涮坛子"就是因家庭主妇爱清洁而常涮洗瓦罐的意思,洗净瓦罐后,人自会感到舒适愉快,所以俗语用"涮坛子"来表示人们借开玩笑显示对于愉快心情的向往。而"扯把子"一语,则是四川农民借好事者爱把整整齐齐捆在一起的草把子胡乱扯开,用以形容人们夸张说谎所产生的引人发笑的结果。所以"扯把子"也有用夸张语言说谎而引人发笑的意思。总之,四川人不仅爱"涮坛子"开玩笑,也有爱以"扯把子"方式引人发笑的习惯。惟其是这样,四川人说话就很诙谐风趣。拓林《四川儿歌》因受川人这种个性的影响,故也将儿歌写得诙谐机趣,幼童一读,就爱不释手。《四川儿歌》一书所收作品,大部分都具有此一艺术特色。

另外,此时的孙铭勋还在上海《小朋友》1957 年第 21 期杂志发表了童话连环画《老鼠的一家》。该作品是贵州高原遍布野生动物因而儿童文学也往往多以动物为描写对象的创作特色的直接反映。对此,马筑生在《贵州儿童文学史》第 181 页中写道:

> 在贵州居住的几乎所有民族都有丰富的饶有风趣的动物故事流传。……贵州动物童话故事不同于一般民间童话故事。它虽以动物或主要以动物为故事主人公,但一般却不原原本本地讲述动物本来的生活,而是赋予动物以人的社会意识、思想和语言等特点,并通过动物之间现实的或幻想的关系,把动物人格化,曲折地反映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思想感情。

孙铭勋创作设计而由詹同绘制的童话连环画《老鼠的一家》,正是这样地通过对老鼠的拟人化,叙写一个小女孩晚上睡觉后,几只出生不久的老鼠钻进她的鞋里。次日小女孩发现老鼠,她没有按妈

妈说的把老鼠拿去给猫儿当点心,而是悄悄用笼子养起来,于是,小女孩便与老鼠成了好朋友……

由于《老鼠的一家》发表时,正值我国处于“除七害”运动期间,且老鼠传播瘟疫,所以《老鼠的一家》便被当做对抗国家政治运动的坏作品加以批判。不久,孙铭勋还被划成“右派”而被剥夺了创作权利,至此他便在文坛销声匿迹。

可是,《小朋友》杂志编辑鲁兵不怕引火烧身,遂化名严冰儿撰写了《这是给儿童看的画》在上海《新闻日报》上发表。鲁兵在该文内,引用鲁迅《朝花夕拾》里的《狗·猫·鼠》一文对于鼠的可爱予以充分肯定,并以此反驳人们对于《老鼠的一家》的严厉批判。对此,我在《<小朋友>90 年》[4]一书里,还说过下面两段话:

> (鲁兵)文章借鲁迅散文的赏析,说明鲁迅可以歌颂隐鼠,《老鼠的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歌颂那老鼠的一家呢?
>
> 值得庆幸的是,事隔二十年后在庐山举行的全国少儿读物出版工作会议以及之后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5]中,终于出现了对错误批判《老鼠的一家》的反思。透过出版界的拨乱反正,从而恢复了被尘封已久的拓林童话的艺术光泽,同时也为《小朋友》杂志登载《老鼠的一家》和鲁兵撰文为拓林童话辩护而遭媒体无端攻击恢复了名誉。

上述事实说明,充分传承了贵州儿童文学善于描写和表现动物题材的孙铭勋童话《老鼠的一家》,在我国极“左”思潮猖獗为害的年代,该优秀作品及其作家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肯定和表彰,反而遭到严酷的迫害。可是,历史终究是不会让邪恶势力得逞的,翻过了那黑暗的一页,光明仍将回到人间。如今,孙铭勋创作的无论是儿童诗歌,还是寓言童话,都因有着对于贵州儿童文学那山野蛮荒和粗野艺术气息的有力传承而闪耀着不灭的光辉。孙铭勋当年在重庆西南师院从事儿童文学的教学研究,不但萌发出了新芽,甚至还结出了极为丰硕的果实。

孙铭勋当年虽然遭到残酷迫害,但其弟子如罗淑芳(西南师院中文系儿童文学教授)、陈道林(华中师院中文系儿童文学教授)、女儿孙丹年,以及他的同年级学友王泉根等人,由于对儿童文学的执著追求与传承,他们在我国儿童文学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孙丹年在贵州出版的传记《陶门弟子教育家孙铭勋》,可视为一本权威的儿童文学研究著述。王泉根在北京师大从事的系统儿童教学研究与大量理论批评,早已名扬全国,这里就无须赘言了。

总之,孙铭勋在儿童文学创作和教学与理论研究方面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再一次说明儿童文学作家都是通过那“刻在时间记忆上的回旋诗”来进行再度传承和发扬光大的。儿童文学史的编写,对于后世作家的创作,具有无比巨大的传承和影响价值。

[参考文献]

[1]马筑生. 贵州儿童文学史[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6.

[2]彭斯远. 重庆儿童文学史[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

[3]王泉根. 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4]彭斯远.《小朋友》90 年[M].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81 - 82.

[5]方卫平. 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M]. 南京: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1993.